

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5，4，311頁。

本書為「上海史研究譯叢」之一，日文原版由日本研文出版社初版於2000年，作者小浜正子博士是日本1990年成立的民間學術團體「上海史研究會」的中心人物之一。本書是她在其1998年博士學位論文《近代上海的社團、都市社會以及國家》的基礎上增改而成，探討的主題是「以社團為主軸，以上海都市社會為舞臺，闡明中國近代地域社會的結構及其公共性的性質、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頁287）。從書名就可以看出，此書的論題是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公共領域」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問題。對於此問題羅威廉（W. Rowe）、蘭金（M. Rankin）、顧德曼（B. Goodman）以及季家珍（J. Judge）等分別從漢口商人的作用、浙江地方士紳的角色、同鄉組織的功能以及由報紙而出現的中間地帶等不同的角度作出了開創性的研究。小浜正子的著作會給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帶來什麼新的思路、新的視角嗎？從這一點來說，它顯然是成功的。本書的兩個基本論點——「作為社團網絡的都市社會」和「民間社團承擔的公共性」，凸現了「公共領域」【作者認為日語中「公共領域」的概念是一個從西歐近代初期歷史出發的學術術語，因此另外採用了「公領域」一詞表達相關概念】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中「社團」的重要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正如本書譯者所說的「確有耳目一新之感」（譯後記，頁311）。

全書除序章和終章之外，共四章和一個附篇，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即第一章，考察從清末一直到1927年之前上海社會團體的發展狀況，指出作為社團網絡的上海都市社會逐漸形成，並且從其內部產生了公權力，這一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二部份以具體的社團組織及其活動為例，考察近代上海的公共性。其中第二章研究慈善團體及其慈善事業，第三章研究民間消防組織「救火會」及其活動。而附章則探討了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參政運動，這緣於作者認為它顯示了上海華人社會公共性的另一側面。第三部份由第四章構成，研究南京國民政府對上海社團的重組，意在探討政黨國家統治下公共領域的變化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上是本書的主體部份，其中第二部份對慈善團體和救火會的研究尤其是重中之重。作者在對這兩個社團的研究中大量搜集並開掘了各社團為取信於眾而編寫的較為零散的「征信錄」資料和檔案，揭示了這些社團從未被研究過的活動，尤其顯示了作者的苦功，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以及上海史研究的史料挖掘和史料擴充作出了貢

獻。此外，序章交代了本書的問題設定和作者的視點，終章則簡略敘述了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社團的變遷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並最後總結全書的論點。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本書的一大貢獻在於為近代中國「公共領域」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提供了從「社團」角度進行探討的新途徑。此外還有兩點也值得提出。首先，本書在構架上很花功夫，全書除有序章和終章交待概念、理論和歸納全書論點之外，每章又有引言和小結予以提領和歸納，使讀者便於抓住作者的思路和主要論點，這可以看作是本書在結構上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其次一點涉及作者的研究視角。作者探討的公共領域問題是歐美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中重點關注的問題，作者以之為論題無疑受到他們的影響，但是在切入問題的角度上則體現了日本學者的傳統。具體來說，著者之所以會從「社團」的角度切入上海「公共領域」的問題，主要受到日本學者夫馬進（當然還有臺灣學者梁其姿）關於善會、善堂史研究和森正夫、岸本美緒等人「社會地域論」的雙重影響，這一點作者在著作中也明確提及。我想，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可以使中文讀者在關於中國「公共領域」問題研究中的「美國戰線」【白吉爾語，見白吉爾著，李天綱譯，〈民國時期的市民社會與城市變遷〉，《上海研究論叢》，1998年，頁335。】之外，接觸到日本學者的思路，這也許是本書中譯的另外一層意義。

概而言之，作者為我們描述了這樣的一幅歷史圖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20年代，上海眾多民眾自發組成的新舊社團空前活躍，上海都市社會作為社團網絡由此逐漸形成。民間社團是上海社會公共性的承擔者，它在地方自治運動中獲得了「地方公益」的新理念。在國家權力衰落的背景下，以都市精英人士為領導的、以社團為載體的社會力量是「公共領域」的主導力量，同時官方對民間社團的干預時強時弱，二者的關係基本是協調的。而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政府為了通過社團實行國民統合對上海的社團進行重組，民間社團接受了政府的領導，國家與社會在公共領域的互相滲透進一步發展了。取而代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則採取了使社團解體的政策，而以戶籍管理為基礎，通過居民委員會和單位對人民實行領導。隨着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再次出現設立社團的熱潮。在此歷史敘述的基礎上，作者概括出中國「公領域」的兩大特徵：一是地方精英領導的社團的巨大作用，二是國家與社會的協調性以及官、公、私之間容易混淆的關係。

對於本書的評論，除譯者葛濤在《史林》雜誌2001年第1期發表介紹文章之外，日本學者也有幾篇書評問世。其中吉澤誠一郎的書評受到作者的重

視，並在本書「致中文版讀者」中給予回應。吉澤氏批評的最重要方面是，他認為「公共性」的概念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不同立場、意見的並存為前提進行討論的場合」；一是「以社會一元化的共同意識、一體感為前提，謀求社會全體的利益的理念」。而本書的公共性只屬於其中後者的範疇。對此，作者表示首肯，但是她提出公共性的兩個方面並非完全不同，二者的實際內容僅是人們在一起時更注重彼此間差異性還是共通性的認識視角傾向的問題。這個爭論對於讀者深化對本書的理解無疑是有幫助的。這牽涉到中國公共領域特點的問題，是中國缺少吉澤所說公共性的第一個含義，還是我們沒有發現它的存在？小浜的回答則是中國公共性的結構和要點正在於它是「以社會一元化的共同意識、一體感為前提，謀求社會全體的利益」。我想，小浜這個肯定的回答顯然與她從「社團」的角度切入問題有關，她把地域社會定性為社團的網絡，這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就被視作政府與社團的關係，而公共領域也就是政府與社團之間的領域（頁7）。但問題是否如此簡單呢？地域社會能夠僅僅被視為社團的網絡嗎？社會公共性的承擔者僅僅是民間社團嗎？舉例來說，季家珍曾經根據上海的報刊提出「中間地帶」的概念【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hao and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參見王敏的書評〈「中間地帶」：晚清上海報人與立憲運動——讀季家珍《印刷與政治》〉，《學術月刊》，2003年第11期。】，提出了報刊媒體在地域社會的角色問題，以及它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問題，不知小浜博士會怎樣看待它與社團的關係呢？

拋開論點不談，本書研究對象是社團的公共性及其與國家的關係，但是作者重點研究的則是上海的慈善團體和救火會兩個社團，其他社團僅是在論及社團與國家關係的演變時予以涉及，先不論慈善團體和救火會究竟是否可以充份代表上海的眾多社團，僅從眾多的、具體的社團活動及其與國家的關係來說，顯然還留下了很多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作者為我們完整地勾勒了社團制度演變的過程，但是對於社團的具體活動尤其是南京政府時期的活動似乎缺乏深入的描述。我想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說，制度設置固然很重要，但日常活動中體現的關係也是不容忽視的（作者提及了此一時期工商同業公會的活動【見頁261】，但這顯然還是不充份的）。最後，作者在論及南京政府時期國家與社會關係時說「通過重組後的社團的國民統合，能夠在現存的體制內反映、代表各階層以及各行業的利益代表【此「代表」二字疑為衍文】」。但是，在抗戰、內戰等一連串的政治變動之中，它並不能真正地

反映民意，對現存體制本身發出議論。」（頁289）這句話是否存在矛盾呢？

張笑川

復旦大學歷史系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By HENRIETTA HARRI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ii, 270pp.**

是什麼使中國人成為中國人？換句話說，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中國人？這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0年出版的《民國市民的形成：1911-1929年間中國的政治典禮與象徵》一書中提出並力圖解答的問題。圍繞本書探討的主題——中國人的身份意識是如何從20世紀早期的變局中產生出來的，著者以1911年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到1929年孫中山葬禮之間的國家典禮與儀式、人們在典禮儀式及日常生活中所採用的各種習俗與象徵為研究對象，探討20世紀早期的國家典禮與儀式如何發揮把個體歸類進群體的作用，創造出新的政治文化，進而影響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最終產生出新的中國人意識的。沈艾娣承襲Joseph Levenson的觀點，認為現代的中國人身份意識的產生，是從文化主義向國家主義轉變的過程，意味着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現。而且，此變化是發生在普通人中間的廣闊的文化變遷。關於現代國家主義的產生過程，沈艾娣又吸納了Benedict Anderson關於「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這一理論，認為國家主義非既存，而是被創造出來的；族群也是如此。而個人既是族群的一份子又是國家的一份子，因此，族群和國家主義就是常常以儀式和典禮的方式把個體歸類進各種群體（包括納入和排除兩個方面）的產物。她認為，中華民國舉行的各種儀式和典禮，既促成了不同共同體的形成，也促成了不同共同體之間的權力層級的形成，而民國市民就是一個以一系列習俗、象徵為依據進行身份定性的群體。

第一章「使革命超越政治：辛亥革命與普通人」分析了孫中山、黎元洪、袁世凱先後就任總統的三個就職典禮，並從這三個不同典禮及其地方版本中總結出一些共同元素：剪辮子、穿西裝、新式禮節、採用陽曆改變歷史敘述的面貌、提出領土要求、以職業團體代表的名義參與典禮、女性參與典禮等；其中剪辮子更成為民國初年影響全國地方的少數政策之一。這些元素從前被歸類為外族的標誌，現在被民國締造者當作是國家認同的標誌。沈艾